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辽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史学批评 与史学文化研究

主 编 瞿林东 葛志毅

副主编 罗炳良 郝振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辽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史学批评 与史学文化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瞿林东,葛志毅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3
ISBN 978-7-207-08162-9

I. 史… II. ①瞿… ②葛… III. 史学—研究 IV. 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7339 号

责任编辑:孙国志 张 红

封面设计:李天语

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

Shixue Piping Yu Shixue Wenhua Yanjiu

瞿林东 葛志毅 主 编

罗炳良 郝振楠 副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7.5
字 数 700 千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162-9/K·963
定 价 65.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代序：史学批评的宗旨 和史学文化的意义

瞿林东

史学批评和史学文化是两个联系密切的论题。史学批评是对有关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史学问题发表评论性、商榷性意见与见解，其功用是联系史学与社会公众的桥梁，也是推动史学不断发展的内部动因之一。史学文化是阐发史学的文化价值，或是从文化视角论说史学的社会意义，它既有利于史学功能的发挥，又有利于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

这里，我想就史学批评的宗旨和史学文化的意义，讲一点粗浅的认识，并向与会的学者、专家朋友们请教。

一、史学批评的宗旨

什么是史学批评的宗旨？概括说来，就是对批评对象的评价或商榷。没有评价，不能认为是批评；没有商榷，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批评。当然，这都是从整体上来说的，当涉及具体的史学批评对象时，情况又各不相同。举例说来，如：

（一）对同一批评对象有所肯定，有所否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所见甚多，如班彪、固父子评论司马迁《史记》，范曄评论班固《汉书》，都属于这种情况。从他们的批评中，对其肯定与否定之方方面面，都会激起人们的思考，不论赞成不赞成这些肯定与否定，人们都会凭借自己的认识提出一些根据，这些认识和根据一旦写成文字，流传开来，又会引起更多人的思考，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史学的深入认识。

在这方面，刘知几的《史通》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给我提供足够的思考空间。从整体面貌来说，这两部书在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方面显得很突出，如《史通·二体》篇论编年、纪传的长处和短处时，讲得很辩证；其《直书》、《曲笔》



则是对两种不同的作史态度进行评论;而《杂述》篇又对各种短书小说的文献价值作了全面的评论等等。这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刘知几说他的《史通》是“商榷古今”,这种“商榷”的理念和态度是十分可取的。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都是在“正史”范围内进行商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启发和许多可以进一步研究、探索的问题。

(二)对同一评论对象的学术价值作出理论上的评价。这在史学批评中是常见的现象,而人们经常引用的有力例证,是陈寅恪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前者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作了理论上的评价,以致许多年后为学界所引用。后者名为“审查报告”,实质上是一篇精彩的评论,发表了评论者对中国哲学的见解,也评价了《中国哲学史》的学术价值。这两篇评论性文字,被后人引为史学批评与学术评论的佳作和榜样,就在于它在理论上的启发性。

(三)对同一批评对象中的缺点,作有根据的否定。这在史学批评现象中也是常见的,从史学史上来看,吴缙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可视为代表作。当然,这绝不是说,吴缙的这两部书没有任何缺点,但总的来说,吴缙所“纠”之“谬”、所“纂”之“误”,大多可以成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对同一史学现象作综合的估量,进而从理论上提出商榷性的意见。这种史学批评方法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一般都比较广泛,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等,史学界发表了大量商榷性文章,不断把讨论的问题引向纵深,提高了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也提高了人们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可以说,没有这些商榷性的史学批评,中国史学在理论上的水平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高的程度,在中国通史、断代史与专史的研究和编纂上,也不可能拥有今天的成就。尤其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的是,1961年在全国几个重点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关于史学史研究对象、任务和范围的讨论,对中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开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64年2月,白寿彝先生在吸收史学界同行讨论、商榷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这篇文章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观点,也不是针对某一篇文章的观点,而是就这几年的学术讨论发表的。其价值在于,它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究竟要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这篇“商榷”文章,对后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种针对一种现象、一次讨论,以至于一个思潮所发表的“商榷”,要求作者在气量上和理论上都要更高一些。

(五)对比较研究的对象作全面的、辩证的分析。如果说上一种史学批评方



法给我们以某种警示,那么这里说的比较研究中的方法,则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明代史家王世贞比较国史、家史、野史的长短得失时,很客观地考虑到它们各自产生的条件,以及由于这种不同的条件使它们所具有的自身特点,并对此作了辩证的分析。这不仅在史学批评的方法上给人们很大启发,而且在理论上也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结论,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自我批评。这是史学批评的最高境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学术工作的真诚以及对社会的崇高责任感,因此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总是能够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的“自我批判”,范文澜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对《中国通史简编》中的缺点和不足所作的“自我检讨”,侯外庐在总结自己一生治学的原则时,强调“执行自我批判”是原则之一,白寿彝在《史学概论·题记》中自我批评曾经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史学理论课程讲授的不妥,等等。这些自我批评的意义,不只是提高了他们自身的史学修养,而且也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树立了榜样。这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宝贵财富。

当然,在史学批评中,也有一些不妥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做法。比如:

有一种情况是,对进行比较的对象作绝对肯定与绝对否定的评价。比较研究,是开展史学批评的一个必要的和有效的方法。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比较的对象作全面的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从而得到较公允的结论。在中国史学上,有的比较研究者,对比较的对象陷于绝对肯定与绝对否定的境地,虽然也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但毕竟是一种片面性方法。如郑樵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史学家,他的《通志·二十略》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但是,我们注意到他那篇影响极大的《通志·总序》,对司马迁《史记》作绝对的肯定,对班固《汉书》作绝对的否定,在比较研究的方法上,以及对评论对象的全面认识上,都给人留下了不少遗憾。

还有一种情况是,对同一评论对象从整体上作无根据的全部否定。这在史学批评上也时有所见。有人说,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史学著作,都是“秽史”。有人说,“文革”前十七年的史学是“政治化史学”、“极左史学”等等,就是这种“批评”方法最典型、最糟糕的例证。这种“史学批评”,因不作任何分析,因而是片面的;因没有任何充分的根据,因而是最“容易”的;因带着极端的偏见,故没有任何学术上的意义。一言以蔽之,这种所谓“史学批评”,不是学术,而是某种极端偏见的任意发泄罢了。

类似这种情况,我们应持的态度是:对于前人,我们不必苛求,但也不必为贤者讳,指出来就是了。但对于现实中一些持有偏见的同行,则应当摆事实、讲道



理,以明辨是非,还史学的真面目。

为了推动史学的健康发展,为了使史学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史学批评工作。

二、史学文化的意义

我对于史学文化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这里只是凭着自己的理解,讲一点认识。

什么是史学文化?依我的肤浅认识,它既包含着阐述史学的文化意义,又包含着从文化的视角观察、论说史学的社会意义,具有丰富的内涵。比如,史学与社会生活、史学与人生修养、史学与人文素质、史学与文化积累、史学与文明传承、史学与民族精神等等,都可视为史学文化。

这里,我仅举史学与文明传承为例,说明史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大家知道,近些年来,史学界、思想界、文学界和考古界都加强了对炎黄文化精神的研究,并发表和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以黄帝文化精神的研究来说,其历史意义在于它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在文明传承方面反映出来的巨大作用。这一方面表现在史学中反映的各民族间的历史认同,如在血缘观念、地理观念、治统观念等领域;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如在心理、制度、道统等领域,都十分突出。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有力地阐述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即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伟大国家,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它既包含着多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又贯穿着五千年文明传承的文化纽带。

关于史学与人文精神、史学与人生修养、史学与文化积累、史学与大众文化等方面,我也曾写过一些文章。我真诚地认识到,史学文化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领域。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史学工作者和学术界的其他朋友们,都是大有可为的。

2008年9月4日

撰于疗养之中

目 录

史学批评综论

官方史学视角下的中外史学比较	乔治忠(3)
应当切实加强史学批评范畴研究	罗炳良(17)
再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	白云(28)
论中国传统史学直书精神的形成和特点	
——兼谈直书何以服从“名教”	周文玖(58)
论“史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	刘开军(71)
史部独立与史学批评的发展	马艳辉(79)

史学批评专论

王充《论衡》的史学批评	施 丁(93)
两晋南北朝史体优劣论	唐燮军(106)
范祖禹《唐鉴》的编纂及其内容特点	
——以《唐鉴·太宗》为探讨核心	朱振宏(121)
南宋浙东学派的史学批评	蔡克骄(145)
祝穆《方輿胜览》的著述旨趣及其编纂特点	宋馥香(150)
史例不取宋子京	
——金代王若虚对《新唐书》的批评	吴凤霞(159)
王世贞的史学批评及其理论贡献	向燕南(167)
易代修史中的史学批评问题探论	
——以清朝《明史》修纂为例	段润秀(176)
清代史馆中史官的“生存”状况	
——从一个侧面看史馆修史与专制社会的关系	王记录(184)
超越考据的视野:钱大昕的制度阐释与历史评论	施建雄(194)
二十世纪史家对“通史家风”的继承和发展	赵梅春(206)



史学批评与国史研究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总结反思与理论发展趋势 曹守亮(220)
-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 张剑平(234)
- 坚持与发展:漆侠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
..... 毛 曦 王善军(252)

史学批评与社会环境

- 以苏联史学在中国的命运为例 邹兆辰(263)
- 当代中国大陆的史学评论理论研究述评 徐国利(276)

史学文化综论

- 中国古代史学的精神文化传统 葛志毅(299)
- 学术理路与史学生态 何晓明(315)
- 史学与人生——史学功用别论 张文生(328)
- 论“通经致用” 汪高鑫(335)
- 历史教育: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尤学工(347)
- 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 张荣明(354)
- 相对主义、叙事主义与历史学客观性问题 彭 刚(362)
- 试论影响历史评价的若干因素 邓京力 马 敬(384)

史学文化专论

- 浅论司马迁游学 杨 铭 赵玉宝(399)
- 明代浙东史家胡应麟生平考辨 王嘉川(406)
- 晚清中小学国史教科书述要 李孝迁(422)
- “新史学”之“新”义
——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观中的佛、儒思想因素 江 湄(433)
- “梁启超式的输入”的真意义
——兼论中西史学文化的接轨与融合 宋学勤(450)
- “书评”中的学术批评
——《燕京学报》“书评”栏目的特色 张 越(464)
- 试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 黄海烈(472)
-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与经学史上的一个问题 李 锐(485)
- 关于“易中天现象”的若干思考 李传印(496)

自我他者与和谐世界的构建

——从“全球史”视野的思考 陈晓华 林 硕(507)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观念

——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讨论中心 陈 新(514)

论布鲁尼的史学 李 勇(524)

谱志研究

中国古代档案工作者地位变迁考 赵彦昌(537)

融合中的变化:传统史学与中国佛教方志的发展 曹刚华(549)

论徽州家谱的评价理论 徐 彬(558)

《重修琴川志》述评 游 彪 刘雅萍(569)

明代宁夏地方志书编纂析论 薛正昌(575)

史学批评综论

ShiXuePiPingZongLun

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

官方史学视角下的中外史学比较

乔治忠

从不同角度观察一个事物,往往会得出一些不同的感悟。研究复杂的历史学问题,视角的选择更是得出或深或浅认识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中外史学的比较,近年虽然成果相当丰富,但似乎从官方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显得薄弱。那么,让我们从此处切入,看看官方史学视角下的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应当得出一些什么结论。

一、中国古代的官方史学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史学活动的主体不仅仅有各自独立的史家和史家私下的组合,而且有着政府专门的实体机构。中国政府记史、修史和修史机构的组建,呈现为制度化、组织化,许多记史、修史机构更是常设性的。因此,我们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中,不能不注意到官方、私家这两类性质不同的史学活动的主体,不能忽视中国史学史上的发展切实存在官方与私家两条相互联系的轨道。

在中国史学史上,官方史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项内容:

1. 制度化、(官僚)组织化的记史和修史机构;
2. 官方切实控制和管理下的史籍编纂;
3. 拥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官方史料和官修史书;
4. 官方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
5. 官方史学的政治作用和学术地位。

前三项是构成完整官方史学的基本要素,只有前三项内容大体具备,官方史学才构成相对于私家史学的又一条史学发展的轨道。在中国古代,形成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相互联系的轨道,是中国传统史学得以连续不断发展并且达到繁盛兴隆的主要原因。

官方的史料和官修史书是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量、质



量、作用及影响上,都处于可以与私家对等的地位。官方的史料包括有朝廷及各级政府公文、案牍形成的档案,经过初步整理的档案册籍,起居注、日历等等原始的与整理过的历史记录。官修史书是指官方组织纂修并以传之后世或公之于众为目的的历史著述,在这些历史著述中,材料经过一定程度的鉴定和剪裁,采取一定的义例及文字表达方式。官方史料与官修史书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前代纂修的国史,总是被新朝视为编纂断代史的史料。官方史料与官修史书,无论是否流传下来,都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发挥过重大的作用,有成就的私修史书也大多利用了官方的史料和官修的史书。

中国西周初年就产生了“殷鉴”的理念。周灭殷商,在当时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面临殷商顽民反抗的周初统治者,思想也发生大的动荡,他们要思考周政权如何巩固、殷商为什么灭亡、怎样避免殷商的覆辙等等。《诗经·大雅·文王》^①曰“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都是明确地要从历史中汲取鉴戒。“殷鉴”的思想,冲破对上天绝对迷信的意识桎梏,是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尚书》中《康诰》、《召诰》、《酒诰》、《无逸》、《立政》等等,都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夏、商到周文王、武王的历史,从中概括出一些经验与教训,“惟命不于常”^②的天命转移观念,“敬德”、“保民”的政治方针等等,^③都是从历史思考中得出的。

以“殷鉴”为标志的历史认识,这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史学的兴旺发达,官方史学活动的绵延不废,史学与政治的密切结合等等,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思想的源头。周初由于具备了“殷鉴”的历史意识,不仅自觉地保存更多的官方文书,而且整编了殷商时期的历史文献。^④从注意保存档案、文书到特意记载史事,是历史意识向史学意识的跨越。白寿彝先生根据《墨子·明鬼》篇等资料,判断“编年体国史的出现于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⑤,这是极其有价值的判断,官方记史制度的形成即始于此时。至春秋时期,东周及各个诸侯国都具有比较完备的记史制度,皆有编年体形式的载籍,且形成“君举必书”^⑥与“书法不隐”^⑦的理念,以及“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谕之”^⑧的机制,即史官利用记史制度和讲解史事,向统治者做出行为制约和思想诱导,提供鉴戒,记录历史已成为官方行政机制的组成部分,可见中国史学原本就是从官方产

① 《文王》一诗,据《吕氏春秋》为周公旦所作,参阅朱熹《诗集传》。

② 见《尚书·康诰》。

③ “敬德”观念,见《尚书·召诰》等,“保民”,见《尚书·康诰》等。

④ 据王国维《古史新证》、张西堂《尚书引论》,《汤誓》、《盘庚》等篇为西周初年整编。

⑤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⑥ 《国语·鲁语上》。

⑦ 《左传》宣公二年。

⑧ 《国语·楚语上》。



生的。

战国至西汉时期,私家史学发展超越官方,但东汉朝廷即不再专事历史记录,而参照《史记》、《汉书》的模式,组织官员纂修纪传体的国史《东观汉记》。官方不仅记录史事,而且组织编纂成品的历史著作,标志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轨道已经形成,此为史学发展的一大变化。唐朝设馆修史成为定制,而且取得突出成果,后来各个朝代对官方修史体制皆加以承袭和强化,这是不可忽视的政治文化现象。

明确认识到中国传统史学是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又互相牵制的进程中发展,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将古代官方史学作为与私家史学同等的观照对象,考察官、私史学之间的关系,会对诸多史学现象得出更深刻的认识。在官方史学视角下比较中外史学的异同,有助于揭示史学发展的本质性问题。这是史学史研究亟须注重的课题。

二、中、西史学的异同

古代中国、希腊,都很早产生了史学,但因地理悬隔,当时并没有在史学上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条件,乃是各自发展。但史学在其最初产生之际,无论东方、西方,都以记载以往的人间事务为基本特征,都是记述人类社会以往的历程,并且予以认识、解说和反思,这就决定了中西史学具有基本理念的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 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

中国古代史学很早就具备了“直笔”意识和求真观念,据记载,春秋时期曹判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①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君举必书”是指无论君主的行为是否合乎礼义,都要记载,这其中已包含了某种求真的意识。《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官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于史册,据称后来得到孔子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里提出“书法不隐”作为判断“良史”的标准,明确地强化了历史记述的“直笔”观念和求真准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起到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后,这种直书、实录的观念为官方和私家所共同认可。至唐朝,干脆将官方记载皇帝和一朝政务的编年体史书命名为“实录”,独占了这个体现史学根本精神的词语。而史学家刘知幾在其《史通》中,极力提倡直书、实录的撰史精神,排斥篡改史实的曲笔。宋代史家吴缜认为撰史的三大要素是事实、褒贬、文采,其中“事实”居于首要地位,“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

^① 《国语·鲁语上》。



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①这些事例,是在理论上表达了记史求真为首要的观念。而蓬勃发展的中国历史考据学、历史文献辨伪学,更是治史去伪存真理念的实际贯彻,至清朝乾嘉时期,考据学派更提出“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其成就是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精华。

西方史学可以从古希腊说起,“希腊人是史学创始人,正如他们也是科学和哲学的创始人那样。欧洲的史学无须向更古的时代追溯了。”^②希腊史学具有显著创始意义的著述是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的《历史》(又称《希波战争史》)。这部《历史》虽然采取有闻则录的编纂态度,但希罗多德对史事往往“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常常在叙述传说之后申明“我是不能相信这个说法的”。^③因此,希罗多德具备了一定的记事求真意识。其后,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396)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声明“这些事实是经过我尽可能严格而仔细地考证核实了的”。美国史学家汤普森指出:修昔底德“相信历史家的首要责任就是消灭那些假的事实”,^④他的著述中没有任何神话的成分。修昔底德真正建立起西方史学的著述规范,就是严格的求真态度。发扬修昔底德撰史传统的史学家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1—前120),更富于严格的批判性,而其史学批判的首要标准,乃是事实的是否真实可信,他认识到,“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求真是最重要的”^⑤。而在此前后,西方也出现多样性的史学主张,甚至有“历史是艺术”的说法行世,但撰写历史就是要真实的理念仍十分强劲。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时期著名诗人、学者卢奇安(约125—192)在《论撰史》^⑥一文中,批判与挖苦了撰述历史中诸多不顾史实、夸夸其谈等偏向,指出“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他还认为历史著述与文学艺术根本不同,“历史家的最大危险是诗兴勃发陷入迷狂”,“不能区别诗与史,确实是史家之大患”。稍后的罗马史家戴奥谴责了“几乎每件事情,总有一种与真相不符的说法盛行”^⑦的记述。这种求真的西方传统思想,至近代的德国史学家兰克(1795—1885)学派被发挥到极致。可见记史求真,仍是西方史学基本的价值观念,这与中国传统史学是一致的。

(二)关于史学之社会功能的认识

中国先秦时期,史册可资借鉴、可以辅助政治、有益教化的观念即已建立,特

① [宋]吴缜:《新唐书就谬序》,载《新唐书就谬》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美]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中文译本,后同,第31页。

③ 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重印本,后同),第151、306页。

④ [美]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40页。

⑤ 转引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二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⑥ 见于《缪灵珠美学译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按:卢奇安(Loucianos)及《论撰史》一文,不同著述译文用字不同,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中作“琉细安”、“应怎样写历史”。

⑦ 转引自[美]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171页。

别是对《春秋》宗旨的阐发中,实际是强调了史学具有的强大社会功能,如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①。《左传》亦曰:《春秋》有“惩恶而劝善”的作用。^②随着孔子的圣化与《春秋》被奉为经典,史学“惩恶劝善”的功能成为不可置疑的宗旨。至东汉季年,《汉纪》一书的作者荀悦在其《申鉴》中,对记史、修史的功能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说,他指出:“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肆赏罚,以辅法教。”^③此后,关于史学惩劝、垂训、鉴戒、资治、教化等功能的论述日益丰富,可总括为“经世致用”的宗旨。而在宋代理学兴起的背景下,史学“明道”的观念日益畅行,并且升华为凌驾于事功之上的理念性追求,试图达到一个思想体系的完美实现,从而指导社会机制的运行,如朱熹自称《资治通鉴纲目》功能是“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既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④。而这种“明道”观念,最终还是属于经世致用。因此,中国古代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乃是以经世致用的观念为主导。

西方古代史学自产生以来,同样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希罗多德自称其著述目的是保存“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固有的光辉”,实际上是要凸显历史人物做出的创树,通过对比与评议,讴歌雅典的民主政体,提倡先进的制度和文明。波里比阿对史学和史书的应用功能做了更深刻的论述:“只有以类似的历史情况和我们自己的处境对比,才能从中取得推断未来的方法和基础。因为只有学习过去,才能学会在现在的情况下,什么时候行动应当更谨慎些,什么时候行动应当更勇敢些。”《罗马史》作者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认为:历史著述的作用是“可以看到各种教训,犹如显明地刻在纪念碑上,从这些教训中,你可以替自己和替你的国家选择需要模仿的东西,从这些教训中还可以注意避免那些可耻的思想和后果”。另一史学家塔西陀(约55—120)则提出格言化的论断:“历史的任务是赞美正义、揭露邪恶,以为后世殷鉴。”^⑤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贯彻着史学为教会服务的宗旨,这当然是史学社会功能的扭曲,但并不是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否定。人文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等等近代史学流派,也有许多史家倾向于关注现实社会,主张从历史研究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当然,西方也存在着反对治史求用的观点,但表达得大都比较委婉,如被称为“客观主义”史学家的兰克(1795—1885),他没有公然

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左传》成公十四年、昭公三十一年。

③ [汉]荀悦:《申鉴》卷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明黄省曾注本。

④ [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载《资治通鉴》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以上转自[美]J. 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文译本,上卷第一分册,第80、108、128页。